

☐ 王水照 况周颐与王国维

☐ 王 蒙 《红楼梦》与现代文论

☐ 吴中杰 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

☐ 唐小兵 成长小说与内心经验

☐ 刘小枫 普罗米修斯之罪

☐ 郑克鲁 现代法国小说的演变

☐ 孙 逊 《红楼梦》图像传播研究

经典 与理论

——上海大学中文系学术演讲录（II）

陈晓兰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经典 与理论

——上海大学中文系学术演讲录（Ⅱ）

陈晓兰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与理论:上海大学中文系学术演讲录Ⅱ/陈晓兰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309-06535-0

I. 经… II. 陈… III. ①语言学-文集 ②文学理论-文集
IV. H0-53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5662 号

经典与理论:上海大学中文系学术演讲录Ⅱ

陈晓兰 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李又顺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崇明南海印刷厂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57 千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9-06535-0/H · 1294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本书是上海大学中文系学术演讲系列的第二辑。自2005年被确立为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以来,上海大学中文系依托中文教育高地的建设与发展,邀请了国内外上百位资深学者、知名作家,与上大师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做了一百多场演讲,内容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极大地开拓了广大师生的学术视野,激发了问题意识,加强了上海大学师生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和对话。为使这些学术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特编辑此演讲录以飨读者。

由于篇幅所限,本演讲录只收录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语言学领域的30篇讲稿,内容涉及中外人文经典的现代诠释、中国当代文化现象以及文学创作的总体把握与个案分析、在总体文学的视野下对于文学的变体与形式及叙事伦理批评的剖析、在跨文化视野中对于中外文学关系和文学传播媒介的研究以及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汉语研究等等方面。

对传统人文经典的解读,一直是上大中文系学术演讲的主要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陆永品研究员多年来从事庄子研究,他对庄子的讲解深入浅出,渗透着现实关怀。他认为,庄子融合了哲学家的睿智、文学家的风采、美学家的情趣和思想家的胸怀,他向往“至美至乐”的国度,是中国历史上和文学史上第一个追求绝对自由、主张个性解放的人。王蒙和孙逊两位学者对于《红楼梦》的解读,赋予了这部经典现代意义。王蒙先生认为《红楼梦》表现了时间的多重性,小说向读者展示了女娲纪元、石头纪元以及贾府纪元三重时间。《红楼梦》充满了各种文化符号,对这些符号的解读与重组不断为人们提供新视角来理解《红楼梦》。王蒙先生运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分析了《红楼梦》中主要角色的性心理,认为《红楼梦》对人生提出的种种质疑与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想中透露出的颓废气息不谋而合。而孙

逊教授对于《红楼梦》图像传播的研究则为我们展示了当今“读图时代”的悠长历史,他认为人们欣赏图像的趣味古已有之。《红楼梦》自从问世的那一天起,可能就已经有图像同它一起流传了,孙逊教授从随同正文流传的《红楼梦》插图,以图为主、文字为辅的《红楼梦》画册,相对独立的《红楼梦》绘画,到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各个阶段,细致入微地解说了不同时代、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五彩缤纷的插图及其意义。此外,傅刚教授对于《文选集注》之发现与整理的梳理、杨明教授对于《文心雕龙》指导思想的剖析、曹旭教授对于《诗品》的研究以及王水照教授对于王国维与况周颐之不同的宋词审美范式的研究,也都体现了他们各自的治学风格和独特的学术视野。

对于文学史观的重新认识、对于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总结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是新世纪学术研究不可忽略的方面。陈伯海研究员强调文学史观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文学史观必然关联到历史观、文学观、美学观诸方面,归根结底会涉及哲学观。他的演讲从“文学史何谓”,“文学史何为”,“文学史何以”和“文学史如何”四个方面阐述了“文学史的哲学思考”这一问题。赵敏俐教授的演讲总结了自1920年至20世纪末汉代诗歌研究的发展轨迹,剖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汉代诗歌研究的总体特征及其主导性话语,如“五四”时期历史进化论的角度、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以及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渗透和系统论等方法的盛行,汉诗研究的思想方法的多元化态势。陈引驰教授的“中古文学与佛教”则对佛教文学、佛经文学、佛教与中国文学予以概念的区分,历史性地回顾了佛教与中古文学关系的研究,提出了目前应该关注的问题和研究方法。随着大众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中国丰富的通俗文学为此领域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谭帆教授的演讲从20世纪初的萌兴、30年代的确立、40年代的繁荣,到五六十年代的消歇,再到80年代中叶的重新崛起几个阶段,梳理了20世纪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历史脉络,认为俗文学研究,一要坚持文学史的纬度、文学史的立场;二要有文化史视野,要放宽眼界;三要有雅俗兼合的视角;四要有多元宗教的观念,最后还要注意吸取域外的学术成果。现代文学馆吴福辉研究员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态势的演讲,则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状况以及现代文学史潜在的生机。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

可能再来一次大的变动,现正在酝酿中。近年来,很多学者已经提出各种新的思路:严家炎的“文学生态”理论揭示出文学形态相互关系的规律性认识;杨义要重绘文学地图,尝试建立大文学史的观念;范伯群提出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双翼论”,给人以启发;陈思和的“先锋与常态”的概括包含了未来文学史的一种模式。吴福辉研究员提出把以往主流型文学史转化为多元合力共生的文学史的设想,已经存在的小范围的重新书写,将预示宏大综合的可能。

在中国当代文化的整体背景下,重温现代早期的中国作家以及思想上的交锋与论争及其对于今天的意义,是本演讲录的重要组成部分。吴中杰教授在他的演讲“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中指出:“鲁迅,曾受到过政治的追捧,但捧的未必是他的真价值,有时,为了某种需要,还会将原意进行歪曲;他也不断受到攻击,无论是生前或死后,但攻击的也未必是他的实在缺点,因而,他始终打而不倒。”他的演讲着重分析了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文艺创作的自主意识。陆建德研究员的演讲:“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则为我们重塑了林纾的形象及其文化价值,益使我们深思五四以来“进步”及“政治激进主义”的正负价值及其背后的利益问题。刘士林教授的演讲则分析了现代作家关于江南城市的经验与思考,认为它们不仅记录了现代江南城市文化,同时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再现了传统江南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对于当代文化现象的阐释和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密西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唐小兵教授关于余华80年代的一部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演讲,从小说的叙事结构、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不断重复出现的意象等等入手,深入细致地分析了这部小说中个人的成长、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面对陌生世界的复杂感受以及矛盾的现代化体验等等问题。王尧教授关于“重返80年代”的演讲提出“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文化热”、“方法论热”和“小说革命”以后,“80年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而且是我们思想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因此,在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如果把“80年代文学”置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与变革之中加以考察,可能会使文学当代历史的复杂关系有更多的揭示。雷启立教授的演讲通过当代一些具体的媒体事件的分析,讨论了当代传媒的传播空间以及其中体现的当代中国的文化矛盾。

面对“图像时代”的到来以及许多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导致的文学边缘化以

及整个文学研究的困惑和转向,赵宪章教授的演讲向我们展示了“通过形式阐发意义”的形式美学方法以及文学研究向内转的可能性。他认为,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形式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思想史”或称“主题学”方法是它的基本路数和传统,文学研究的当下转向已经表明这种路数和传统不能适应气象万千的文学现实。“思想史方法”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他的演讲以当代词典体小说和戏仿文体为例,探讨了“文学变体与形式”的理论问题,从而验证运用形式美学方法研究文学的有效性。王鸿生教授的演讲为我们简要勾勒了叙事伦理研究的大致轮廓,自1990年代兴起以来,中西学界的主要著述,诸如对形式、伦理和意识形态修辞性的考察,就叙述、阅读、阐释过程本身所形成的主体间性关系的探讨等等,同时也探讨了文学与伦理之关系的古老渊源以及现代阐释。陆扬教授的演讲分析了德里达解构思想前后的转变,即解构主义从前期“异延”的形而上学转向对社会现实的敏锐关注,并逐一解析了德里达常用的一些基本概念,诸如“文字学”、“逻各斯中心主义”、“补充”、“公正”、“友谊”等等。

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直与西方文学纠结在一起,对于西方文学的阐释、西方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不言而喻是中国文化史及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参与了中国人的世界意识与现代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刘小枫教授对于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的解读,把我们带回到古希腊雅典时期,重新认识火与技术、启蒙与反启蒙、专制与民主政治的重大问题,重新解读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与意义,同时也使我们反思民主、自由的复杂性。郑克鲁教授对于20世纪法国小说的鸟瞰式纵览则使我们领略了现代法国文学的总体成就。他从思潮流派、文学主题与艺术手法等方面,分析了19世纪末以来法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演变。谢天振教授的演讲阐明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及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并提出了译介学研究新空间与新方法。陈建华教授则对1970年以来的30年间中俄文学的关系做了完整的勾勒,并分析了俄苏文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加拿大约克大学徐学清教授的演讲介绍了加拿大华裔女作家的创作历史及其作品所表现的中西文化的冲突、文化身份的认同以及母子关系等问题。

关于汉语研究的四篇讲稿,主要把汉语置于地域文化、国际文化的背景下予以研究。游汝杰教授认为汉语的同义词在产生的初始阶段,往往在不同的地域

有不同的形式,从而呈现多元化倾向。汉语同义词的地域竞争和整合在古今汉语中都是常见现象,在古汉语里表现为在不同地域流行同义单音节词及其竞争和整合,在近代和现代汉语里主要表现为新词在始生阶段有多元化倾向及其竞争和整合。荷兰莱顿大学教授范德博先生的演讲针对上海的语言状况,重点探讨了普通话在当地的传播及其对上海方言的影响,从上海本地人的视角观察上海当前的社会语言环境,并结合大批官话方言区的移民所带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运用社会学和族群语言学的认同理论解释上海的语言使用模式,推断目前在上海社会中存在着六种不同的认同群体,每种群体在内部交流和群体间交流时具有各自不同的语言行为。李如龙教授的演讲重申汉语和汉字之间深刻的内在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正是这种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汉语的特点。潘文国教授的演讲从国家政策、教学机构等方面总结了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现状,提出“汉语国际推广”作为一项“国家事业、民族事业”在今天中国乃至国际世界中的重要意义。

演讲录的编辑与出版得到董乃斌教授、王晓明教授、张寅彭教授、邵炳军教授、蔡翔教授、王光东教授、薛才德教授、董丽敏教授的大力支持。曾军副教授、李翰博士、肖有志博士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并做了最后的文稿校对。此外,《上海大学学报》编辑部的编辑魏琼女士、中文系讲师雷洪波博士、研究生徐一川、郭宇、柳卓霞、刘蕾、侯文冉、李燕青、汪超、周兴泰、罗建新、冀运鲁、刘蕾、孟羽中、姜来波、邹瑞玥、郑思等同学做了录音整理工作。在此深表谢意!

本演讲录的出版得到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项目的资助。

编 者

2008年12月1日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讲 陈伯海：文学史的哲学思考 / 1

第二讲 王水照：况周颐与王国维：不同的宋词审美范式 / 13

第三讲 王 蒙：《红楼梦》与现代文论 / 24

第四讲 孙 逊：《红楼梦》图像传播研究 / 32

第五讲 陆永品：个性、理想、与时俱化——庄子讲座 / 44

第六讲 谭 帆：20 世纪中国俗文学研究漫谈 / 51

第七讲 赵敏俐：20 世纪汉代诗歌研究 / 62

第八讲 傅 刚：《文选集注》的发现与整理 / 73

第九讲 杨 明：关于《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谈刘勰文学思想与先秦汉代儒家文论的重大区别 / 84

第十讲 曹 旭：我的《诗品》研究之路 / 95

第十一讲 陈引驰：中古佛教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 / 100

第十二讲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今态势 / 111

第十三讲 吴中杰：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 / 118

第十四讲 陆建德：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 / 128

第十五讲 王 尧：“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 138

第十六讲 唐小兵：成长小说与内心经验——余华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

解读 / 145

第十七讲 刘士林：现代作家眼中的江南城市气韵 / 154

第十八讲 刘小枫：普罗米修斯之罪——《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前台戏（1—125行）讲疏 / 164

第十九讲 郑克鲁：现代法国小说的演变 / 173

第二十讲 谢天振：译介学：展现比较文学研究新领域 / 181

第二十一讲 陈建华：中俄文学关系 30 年 / 193

第二十二讲 徐学清：加拿大华裔女性文学对母亲与子女关系的探索 / 202

第二十三讲 赵宪章：文学变体与形式——以词典体小说和戏仿文体为例 / 206

第二十四讲 王鸿生：关于叙事伦理批评的若干问题 / 222

第二十五讲 陆 扬：德里达前后期思想比较 / 231

第二十六讲 雷启立：传媒自由的幻象——当代中国的传媒空间与文化矛盾解读 / 237

第二十七讲 游汝杰：汉语同义词的地域竞争和整合 / 245

第二十八讲 潘文国：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推广”——关于对外汉语专业建设的再思考 / 263

第二十九讲 李如龙：论汉语和汉字的关系及其相关的研究 / 268

第三十讲 范德博：语言的活力、认同和扩散：以上海话为例 / 280

第一讲 文学史的哲学思考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陈伯海研究员*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我自己来说,我有这种感受,就是当我在从事文学史上某个课题(不管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一个时代、一个流派的文学)的钻研时,若不打算就事论事地下个断语,而是一路追问它的根由,最后总会碰到文学史观的问题,也就是你对文学史抱有什么样的观念,决定了你对具体问题怎么回答。而文学史观又必然关联到历史观、文学观、美学观诸方面,归根结底会涉及哲学观。任何带有理论色彩的研究,问到底都会碰到哲学观念的问题;好些问题问不到底,解决不透,往往就因为哲学观上出现了障碍,缺乏明确的哲学理念所致。所以我觉得,文学史研究与哲学是密切相关的,这是我要强调从哲学上来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缘由。

另外一点,从文学史学科本身的发展趋势来看,加强哲学思考也是其内在的要求。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正式形成的,从那时开始至今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不下两千余种,论文及专题研究更是多如牛毛。正因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面反面都有),到 20 世纪 90 年代便开始出现普遍反思的动向,学界发出了“建设文学史学”的呼声,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文学史研究本身进行一番学理性总结。随着其不断地向前进展,完全有可能使文学史哲学这个命题凸显出来。所谓“文学史哲学”,我想应该是相当于“历史哲学”那样的东西,即对文学史本身的存在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方法论等根本性问题的一种哲学考察,它构成了文学史观的基本内核,也是文学史学与哲学密切相关的最好表征。文学史哲学并不在文学史学之外,而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作为文学史学的核心理念部分,又需要有比较深入和专门性的阐发。正像文学史研究必然会导致文学史学的建设,后者的充分开展也自然会提升为文学史哲学

* 陈伯海,湖南长沙人。曾任上海师大教授、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社科规划文学学科组成员,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唐诗学引论》、《传统文化与当代意识》、《中国文化之路》、《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严羽和沧浪诗话》、《李商隐诗选注》,合著有《唐诗书录》,主编《唐诗评论类编》、《唐诗汇评》、《上海近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学史》等。

演讲时间:2007 年 9 月 12 日;地点:A602;主持人:董乃斌教授。

的探讨。我在这里之所以突出“哲学”二字,就是要提倡一下这样的探讨,希望大家来关心这个问题,让文学史领域的哲学思考真正开展起来。

文学史哲学思考的范围很广,我也讲不周全,这里姑且用四个“何”来概括:一是“文学史何谓”,就是什么叫文学史,涉及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性质应怎样来界定。二是“文学史何为”,亦即文学史是干什么的,牵连到文学史的目的任务。三是“文学史何以”,即何以会有文学的历史发展,或者说文学史的进程凭什么条件生成,这关涉到文学史的动因。四是“文学史如何”,也就是文学现象在历史上怎样演进,构成了文学史的动向。这四个问题是从哲学层面上看文学史时必然会碰到的问题,值得认真思考,而四者各自又都有丰富的内涵,我只能就每个问题选一个焦点来谈谈。

一、文学史何谓?

有关文学史的对象和性质,我想着重谈一个“人本”与“文本”的关系问题。

我们平时讲文学史,总离不开文学作品,作品是文学史研究的中心对象。但文学作品从哪里来呢?大家知道,作品是由作家创作的,创作是一种文学活动,由创作产生了文学作品,故而研究文学史又不能不研究作家的创作活动。还不仅仅是创作活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作家写成了作品,一直不拿出去,只是放在自己兜里,再也不给任何人看,那么这个作品就等于不存在,它不会为文学史所关注,更不会进入文学史的叙述。创作出来的作品必须加以流传,也就是要传播出去,为人们所接受,它的价值才得以实现,因此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活动也是文学史所要关注的。总之,文学作品的生成、演化与实现均离不开人的文学活动,文学史研究不能孤立地谈论作品,必须联系其背后的人的活动来作考察。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文学史就是围绕着文学作品的生成、演化与实现所开展的人的文学活动史。这样的话,文学史所要考察的范围就更宽广了,不过主体仍应是文学活动。

从上述有关文学史对象的界定来推断文学史的性能,可以说它具有“人本”与“文本”的二重性,且由此形成文学史研究的两大类型,即主要着眼于人的活动来考察文学史,构成以人为本的文学史观;而若更多着眼于文学作品的自身演变来考察文学史,便成了以文为本的文学史观。前者最常见的如以作家传记为文学史的主干,历叙各个作家的生平、交游和创作活动等,可称之为创作活动史或作家传记史,这自然属于“人本”的文学史。还有以文学传播活动为中心或以文学接受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史和接受史,亦是围绕人的活动而展开的,也应归入“人本”的一路。从“人本”的角度来撰写文学史,好处是突出人的活动,体现了人的主导作用,避免

就文论文的弊病,但若一味凸显人的活动而不顾及文学作品的艺术构成,甚至以各种社会事象的罗列来掩蔽文学自身审美价值的体认,这样写出来的就往往是以文学为载体的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而不成其为真正的文学史,这种情况以往并不鲜见。另一类文学史即“文本”的文学史,则不注重人的活动的描述,而是重在文学作品,如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结构主义诸流派,他们研究文学史的兴趣就只限于文本本身。“文本”的文学史好处在于能揭示文学作品内在诸因子的具体变化,确实显示了文学自身的历史演进,但只看到文学因素的演化,看不到它背后的宏观背景,是什么促使这些文学现象演变,文学史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显然也有片面性。以上仅就两种类型的极端而言,实际上,文学史的撰写经常是将人的活动与作品分析杂合在一起的,分析作品时也往往既谈到它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如写抗日战争、写解放战争、写三大改造等),而又要涉及其表现形式(如叙事结构、白描手法、情景交融等),“人”与“文”两个方面似乎兼顾。但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两者之间尚缺乏内在统一性,彼此互相脱节,换句话说,对人的活动的考察并没有真正落实于文本的建构,而作品的艺术构成中也未能充分反映人的生命活动(包括其内在精神活动),文学史的二重性能仍是相割裂的。

如何才能使“人本”与“文本”这二重性在文学史研究中达到统一呢?现成的万灵药方并不存在,但既有的一些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说,我国古代传统将诗歌等文学艺术看作人心在外物感召下进行活动的产物,人的情感活动与其所处的外在环境及整个生命活动不可分离,而这种内在生命情趣投影于文学作品,又必然显现于作品整体风貌,构成其形体的主要标记,这就是古文论中常讲到的“因物兴感”和“因情立体”之说。拿这个观念来看待文学史,就会特别注重从文学风貌的变异中来观照人心和人生的变化,甚至把一部文学史归结为文体流变史。像古人常讲的风雅正变、质文代变、诗体正变等,就都是从文体或诗体流变的角度来谈文学演变的。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里考察从上古到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过程,用了这样几句话作概括:“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这可以说是最早和最简括的文学史叙述了,它正是从文体风格的变迁来讨论各时代文学的演变,也算得上“以文为本”吧!但又不限于单纯的文学本位,因为在“淳而质”、“丽而雅”、“侈而艳”之类概括中同时反映着人自身的审美情趣的变化,甚至映照出整个社会文化心理与时代风尚的变迁,从而将“文本”与“人本”打成了一片,实现了二重性的整合。这自然不是唯一的方案,还会有别样的形态。如晚近西方的接受美学,以接受者的审美期待为立足点,而又以审美期待与艺术文本之间的视界交融当作接受活动得以实现的标志,并从这两者关系的推移互动中来把握文学接受的历史进程,也应该属于二重性的整合。实际上,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不同内容、不同体例的文学史必然会有不同

的写法,其侧重于人的活动或作品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应包括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两个方面,要着力争取将“人本”与“文本”统一起来。

二、文学史何为?

讨论文学史的目的任务,我也只想讲一点,就是还原与重构的关系问题。文学史研究究竟为了还原历史还是重构历史,这是当前学界争议的一个焦点。

一段时间以来,常听得有人标榜要写“原生态”的文学史,我去参加一些博士论文的答辩,答辩者也总是强调自己是在力求原生态地显现所研究的对象,好像离开了原生态便不足以成为够格的历史。当然也有公开反对的,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原生态,文学史本就是见仁见智,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我的看法介于这两者之间。我承认文学史作为客观历史进程是存在的,既然客观存在,就有其原生态。但我认为,历史的原生态不可能复现,“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这句名言至今未曾失效。那么,原生的东西有没有可能遗留下来呢?当然有可能。例如前人写下的文学作品,经过搜集、辨伪、整理、编排,确有一部分能大体保持其原貌,构成比较可靠的文学史料,可算具有一定的原生性。但要看到,留下的资料肯定是不齐全的,甚且只有一鳞半爪残存,要从这些破碎残缺的遗留物中去追索历史原生态,实在是“戛戛乎其难哉”!更重要的是,文学史的对象不仅是文学作品,还包括人的文学活动在内,这就更难以复原了。一个作家哪年到过哪些地方,同哪些人交往,写了哪些作品,甚至作品写在什么情况之下,或许可以做出考证,但更不容易考得周全。至于写作时的动机、心态、灵感、想象乃至连作者自己尚不清楚的下意识心理,你能考出来吗?有什么办法可复原呢?而这些内在的心灵活动恰恰对他的创作起到了直接的影响,脱漏了这个环节,还算得上什么原生态?可见文学史的原生态是不可复现的,虽然它确曾存在过。

于是有人会说,我希求的不是完全复原,那自是不可能,我指的是尽可能还原,即力求逼近历史原貌,这应该是一切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所要追求实现的目标。这个提法显得更有分寸,也合乎情理,却并不全面。文学史研究固然要以某种程度上的还原历史为自己的职责,而又不能局限在这个目标上,因为历史研究不光是一门科学,它还包含着人文关怀。科学要求弄清事实,人文则着眼于提供意义,意义是不断生发的,如何能以还原为限?如果文学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还原,在于力求逼近原貌,那么,当它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时,就成了一种标准的文学史,不会再有发展,研究也就断档了,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前景!还原论的历史观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哲学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它把历史看成为封闭的、凝固的、一次完成了的事实,

现成地摆在那里,等待着人们去发现。文学史研究就是要去找这个东西,一旦找到,把它录写下来,任务就完成了。但实际上,历史并不是封闭、凝固的,它是开放的,向着未来永远开放;历史也并不限于过去发生的事,它还流动到了当前,并通过当前流向未来。比如说,唐朝大诗人李白早已作古了,李白的创作生涯也随之而结束,作为历史的事象,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但李白的诗歌却一直在社会上流传,历唐宋元明清直至现代而未衰,于是李白诗歌跟时代生活的联系,或者说,这一传统对各时代读者的意义则从未消歇,不但不消歇,还会随时代生活的演变而不断有所生发与提升。这表明,历史的通道是永远开放的,历史对于人的意义是永无穷尽的,绝对还原不仅不可能,亦无必要。

我这样说,并不就否定了还原。我的看法是:研究文学史在事象层面上要力求还原,而在意义层面上则不求还原,而要不断生发,这两个方面的目标是不相同的。事象层面力求还原,因为研究历史总要以史料为依据,史实不能凭空捏造,要有根有据,所以考证很有必要,通过考证可以逼近原貌。但还原了部分事实,是否就完成了历史研究的任务呢?当然不是,因为历史还有其多向联系和多重意义等待着发掘。举个简单的例子:一部“诗三百”,由周人采集编定,至汉代称为《诗经》,有齐鲁韩毛诸家注,其中毛传一直保存了下来,并得到后人宗奉。毛传解诗的路子,通常是将其与宗法礼教伦常相结合,比如释《关雎》为“后妃之德”,等等,多为后人诟病。但你说他胡说八道、毫无根据,恐怕也不全然。《诗经》里确有一部分作品跟当时社会的政教伦理是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一些篇章从字面上看不出这种关系,或许产生时也并不涉及这类关系,但它们经过周朝王官的采集、编辑、整理、解说,用作贵族子弟的教材,是负有灌输礼教伦常观念的使命的,所以用礼教伦常释“诗”,不能说一无根据,它体现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群对“诗”与社会生活关联的把握。时过境迁,到了“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就不看重礼教伦常的作用了。《关雎》就是情诗嘛,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表达男子对心爱的女子的思慕,何必要去追索什么微言大义?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它表明《诗经》跟时代的联系通道改变了,不再连接于古代的礼教伦常,却要同现代的个性解放思潮相呼应,其意义就大不一样了。而后到了三四十年代,闻一多等人从社会学、民俗学的角度考察《诗经》,又从中找出许多民俗风情,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习俗。这有没有道理啊?有啊!《诗经》篇什虽然短小,但它贴近生活,确实反映出不少的社会礼俗现象,包括《关雎》这首诗,我甚至怀疑它并非单纯的情歌,而是一首贺婚词,你看它从爱慕、追求一路叙说到定情和迎娶,把整个过程表现出来,不是很像行婚礼时的仪式演唱吗?所以从民俗来看问题的话,是会发现一些新内容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盛行,人们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观念为指导,看《诗经》,又看到许多社会矛盾,如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对立、贵族与平民的对立、西方征服部族(“西人”)

与东方被征服部族(“东人”)的对立等,这也是有根据的啊,也显示了《诗经》意义的一个侧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岭也罢,峰也罢,庐山就是由许许多多、千姿万态的峰岭总合成的,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观赏。任何角度都有可能进入庐山的景貌,但也都不能把握其完整的“原生态”(总貌),因为不同视点常会导致对景物的不同组接,从而使其景观显现出不同的姿容来。庐山常看常新,百看不厌,其动人的魅力不建基于此吗?而若一味追求还原,还原成一个标本、一个模型,那它还有什么吸引力呢?文学史也是如此,正因为它能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来,才值得我们不断去追索,不断去重写,而重写的过程实即对它的原有事象进行新的组合与重构,这哪是“还原历史”一词所能包容得了的?

必须说明,承认历史需要重构,并不意味着把它看成是一种虚构,乃或是神话。学界有这类说法,我是不赞同的。我不单认可文学史自身有它的原生态存在,还认为,即使就文学史的阐释而言,也有比较真实与不真实或不够真实的问题,不能一律看作神话与虚构。否则的话,不同的文学史著作之间还有没有价值高低之分呢?要有,至多便是谁虚构的神话更有趣或更有效了,而有趣和有效都是因人而异的,实际上也就取消了其价值的可比性。依我之见,历史研究的真实性还是可谈的(当然是相对的),它不光指所依据的史料的可靠性,更重要的,是指我们把握历史内在联系的广泛性与深刻性。历史从过去流向未来,其通道是无穷地展开着的,其形态是纷繁多变的,其间有主流,有支流,有回流,甚至有断流。文学史家在建构历史时,对事象的组合愈是能体现历史运动的基本流向,它存活的时空度就越大,也便是其作为历史阐释的可信性愈强;而若选取的通道是一条小路、回旋路乃至断路、死路,流不长也流不畅,那它的真实可靠性就显得很低甚至会很快化为乌有。“文革”后期一度用儒法斗争为主线来概括文学史,它其实也是一种阐释方式,是想从历史中寻找一条导向当时的“评法批儒”运动的通道,也属于重写文学史的活动,但由于“评法批儒”本身只不过是临时上演的一场闹剧,很快收了场,所以这条路走了没两年就断了,以此编成的文学史也便遭到了否定。相反,如果能找到导向历史主干道的通路,发掘出真正具有深远目标的时代意义来,这样的文学史就会流传久远,其相对的真实性也愈高。总之,我不同意文学史研究只能是见仁见智的说法,但也不赞成一味用还原作评判标准,我主张从历史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上来考察文学史的叙述功能,看它在把握历史现象与时代生活演变的关系上是否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与合理性。这是将实践检验真理的理念应用于历史研究,与还原论者的符合论真理观有区别。这个说法在文学史研究领域还没有人说过,提出来和大家共同探讨。至于理想的文学史,我认为应该是在还原与重构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既有还原事实的一面,又有重新建构历史通道和发掘新意义的一面,这才能较好地实现文学史研究的目的任务。

三、文学史何以？

文学史靠什么的作用得以生成和变化,关系到文学史的动因。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很多,归总起来不外乎从文学外部找原因(外因)和从文学自身找原因(内因)两大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他律与自律的关系,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关系。

不过我不打算详细展开这方面的讨论。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 90 年代初写过一本《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着重论述的就是这个问题。书中具体介绍了西方各派文论家和文学史家有关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各种见解,也谈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要详细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可以找来一读。我们以往讲到文学史的动因,也常用两句话来表述:一是社会生活作为文学艺术的源泉,即从整个社会的变化来说明文艺的演变,这属于他律论的文学史观;二是文学发展基于传统的继承与革新,从文学自身的角度来找原因,属自律论文学史观。两方面我们都讲,他律与自律兼顾,似乎很全面,问题在于两者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是分别起作用,还是交互起作用?是平行而不悖,还是互动与互补?看看现有大多数文学史,往往两者都讲到,但互不交涉,时而偏重在从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方面来解说,时而又可能着重谈论文学自身的继承与革新,根据具体需要而定,没有普遍的准则。但外因与内因既然都是文学艺术的动因,其作用必然是相关的,不可能各自分离,这就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出说明,更准确地说,便是要深入探究他律与自律如何相互推移、相互转化的问题,特别是转化之中有无中介以及以何者为中介的问题。以往的文学史研究正因为忽略了这一点,使得他律与自律分拆开来,无法合拢。所以我觉得,讨论要进行下去,关键在于找出其互动的中介。

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被触及。一种意见认为社会心理是由社会生活进入文学艺术的桥梁,因为心理因素既联系着客观世界,而又投影于文本,正适合在两者之间起沟通作用。亦有人感觉社会心理嫌宽泛,创作是文人的事,不如以文人心态为纽带更为贴近。还有人主张把审美心理图式或文本语言范式视作中介,以为这才是构成外部因素转向文学内部结构的户枢。各有各说,却未必相互排斥,因为中介本就可能是一个系列,从而在他律与自律之间形成过渡。我个人对文学史动因曾经有过一个综合的考虑,用三对矛盾的交互作用来解析这个问题。三对矛盾,首先是文艺与生活的矛盾,或者说是客体与主体的矛盾,这是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因。文学现象为什么会起变化,归根到底还是社会生活的变革造成的,生活有了变动,才会促成文学的变异。但生活并不能自动转型为文艺,它必须通过人的因素也就是主体心理的变化来作用于文艺,故而文艺与生活的矛盾便具体显